

身体美学视角下苗族女性鼓舞的社会赋权研究

黄小倩 李 过 王海波 郭振华

吉首大学体育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湘西苗族女性鼓舞实践中，存在一条从身体规训到身体赋权的转化路径。研究以身体美学为理论视角，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方法，探讨女性通过鼓舞实现社会赋权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传统社会中，动作的柔化要求与空间的边界限制共同构成了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体系，但规训与赋权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复杂的转化关系；当代女性通过力量型动作训练、获取领舞者身份以及参与公共空间展演，在身体感知、表达与空间三个维度上实现了赋权；这一赋权过程交织着制度、市场与社区的多方博弈，同时也需警惕市场化带来的身体异化风险。研究表明，身体既是权力规训的场所，也是反抗与解放的媒介——真正的赋权，最终要让身体成为更自由的主体。

【关键词】：身体美学；苗族鼓舞；女性赋权；身体实践；社会权力

DOI:10.12417/2982-3846.26.01.005

身体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权力争夺的场域。对处于传统性别秩序边缘的农村女性而言，身体更是自我表达与争取权利的重要媒介。湘西苗族女性鼓舞从祭祀仪式走向当代舞台，这一过程见证着女性身体的觉醒与社会观念的变迁。传统赋权理论存在“赋权予人”可能导致主体性弱化的悖论，因此需要转向“赋权由我”的服务取向。同时，关系赋权与技术赋权为理解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新视角，但也需警惕技术使用中存在的性别障碍。本研究以身体美学为理论视角，聚焦湘西苗族女性鼓舞实践，考察女性如何通过身体实践实现社会赋权。在击鼓与踏舞之间，身体力量转化为心理力量，私密体验走向公共展演，曾经被规训的身体开始书写自身的话语——这正是“赋权由我”这一核心议题的生动体现。

1 身体美学与社会赋权的耦合逻辑

作为身体美学学科的开拓者，理查德·舒斯特曼致力于研究身体作为感官审美欣赏与创造性自我塑造的场所，倡导通过哲学生活实现自我完善，将身体培养纳入生活实践哲学。其理论核心是通过专注身体功能与经验，克服不良习惯，提升感觉敏锐度。他提出“身体化意识”，突破灵肉二元论，视身体为审美经验中

兼具主客体双重性的存在^[1]。据此，本文将身体美学操作化为三个维度：感性体验、身体意识、身体修炼。身体美学与社会赋权理论的耦合在于：身体既是权力规训的场所，也是反抗与解放的媒介。舒斯特曼认为，压制性权力可在身体中被另类实践挑战^[2]。女性通过鼓舞实践获得力量感与自主性，身体

改变可转化为社会权力。传统“赋权予人”可能导致主体性弱化，应确立“赋权由我”的取向，权利自觉与义务自愿成为持续赋权的核心动力^[3]。据此，本文确立“主体性生成”的赋权观，建立三维分析框架：个体赋权、关系赋权、社会赋权。

2 历史谱系与身体规训：湘西苗族女性鼓舞的文化基因

(1) 鼓舞作为“身体文本”的历史解码。湘西苗族鼓舞是一部镌刻在身体上的文化史。《苗防备览·风俗考》记载，苗族以剝木蒙皮为鼓，令美妇跳而击之，男女旋绕歌唱，举手顿足，应节而舞，名曰“跳鼓藏”^[4]。凌纯声、芮逸夫考证发现，南阳汉代石刻鼓舞图像与今日红苗鼓舞极为相似，推测鼓舞可能由汉代传入苗中^[5]。传统鼓舞的性别秩序在身体动作的分配中显露无遗。女性虽很早参与鼓舞展演，但男性在仪式核心区掌握“鼓魂”，女性多担任伴舞或围观者。鼓舞分为槌舞与拳舞，拳舞多属男子舞，女子不用文。这种分工是苗族传统社会性别秩序的具身化呈现——女性的身体被安置在“美”的展演位置，却与权力核心保持着距离。

(2) 传统性别秩序中的身体规训史。苗族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潜藏于动作规定与空间格局之中。“柔化”成为女性动作的美学标尺：幅度宜小、节奏宜缓。空间边界同样清晰：家庭院落是合法场域，村寨广场与仪式核心区则划为禁忌。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费纳龙(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nelon)曾以性别身体为例指出：有文化、有教养的妇女应该说话轻柔、亭亭玉立、饮食挑

作者简介：黄小倩（1997~），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1）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5ZDB024, 25YBA262, 25YBQ161)；（2）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4B0490, 25A0384)；（3）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502000895)。

剔、坐时两腿紧靠、走路时头和眼朝下^[6]。这套规训机制通过代际传承内化为女性的“身体惯习”，使她们将这些限制接受为“应该的样子”。然而，苗绣等传统技艺同样浸润着身体规训，女性正是通过这套规训习得技艺，而这些技艺恰恰成为她们施展能动性的媒介^[7]。这提示我们，身体既是权力铭刻的表面，也可能成为主体性萌发的裂隙。

(3) 现代性转型中的身体实践重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开发、非遗保护、城镇化进程共同将女性从鼓舞的“边缘伴舞”推向“舞台中央”。多重力量交织作用下，女性打鼓的行为惯习得以延续，角色期待亦被重塑。通过参与打苗鼓，农村女性打破了封闭的社会空间、消极的社会心态与负面的社会形象，变得更健康、自信、独立^[8]。但与此同时，市场化和舞台化也带来了新的身体规训—当“美者”的标准被消费逻辑重新定义，当动作的“规范化”取代“仪式化”，女性的身体在获得舞台的同时，也可能陷入新的规训网络。解放与规训的边界，在现代性转型中变得模糊而暧昧。

3 身体实践与赋权机制：从私密体验走向公共权力

(1) 身体感知层面的赋权：从“羞耻”到“自信”。女性学习鼓舞的过程呈现从禁锢到释放的轨迹。初学者的身体往往僵硬、收缩，害羞使她们不敢抬头，羞耻令动作迟疑；随着习练深入，身体逐渐舒展，力量在肌肉中生长。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力量型动作”的身体美学意义：击鼓力度、跳跃高度、旋转速度等身体数据，是心理能量的具身化表征。通过身体美学的探索与修炼，女性能够获得对有力意志实际运作的“躬行”把握。当她们奋力击向鼓面，鼓声在胸腔共鸣，不仅击打皮鼓，更击碎禁锢身体的隐形牢笼。参与打苗鼓的农村女性打破了消极社会心态，变得更健康、更自信、更美丽、更独立^[9]。这种自信溢出到日常生活—她们改变着装，在公共场合自在表达，曾经属于“城里人”的从容逐渐成为身体的自然延伸。

(2) 身体表达层面的赋权：从“被言说”到“自我言说”。当身体从规训客体转变为表达主体，更深层的赋权悄然发生。女性开始通过鼓舞表达情感、讲述故事、传递价值观，那些由外部力量书写的文化脚本被她们的身体重新编写。“领舞者”的崛起是关键标识：她们成为意义的主动生产者，编排新动作，将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编织进身体语言，获得社区文化解释权。舒斯特曼强调，身体美学关注身体活的经验，改善对身体状态的意识。通过参与打苗鼓，农村女性在运动趣缘场域中实现资本转换与身份构建，逐渐完成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构建^[10]。一位普通农妇成为领舞者后，其家庭决策权、社区发言权往往发生显著变化—身体语言的力量转化为社会话语的权重。

(3) 身体空间层面的赋权：从“私密”到“公共”。空间的变迁是身体赋权最直观的测量尺度。女性鼓舞的空间轨迹

清晰可见：从家庭院落走向村寨广场，从广场登上城镇舞台，从舞台进入网络短视频—每一次空间边界的跨越，都意味着权力版图的重绘。“广场”的意义尤为重大：当女性成群结队占据广场，鼓声在村寨中央回荡，她们不仅在展演技艺，更在改写社区权力地图。空间变迁带来连锁反应：社区公共事务中，“鼓舞女子队”的声音是否更被重视？非遗传承人认定中女性比例是否提升？当身体从私密走向公共，赋权便从个体体验汇聚为结构性的社会力量。

4 赋权的矛盾图谱：正效应、异化与多主体博弈

(1) 赋权的正效应：个体觉醒与社区重构。个体层面，身体自信的提升外化为着装风格改变、公共场合表现自然从容等社会表征；经济自主的增强体现为演出收入占比提升、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参与打苗鼓有助于农村女性搭建“运动趣缘”这一新型社会关系网络，扩展人际交往半径。社区层面，女子鼓舞队从松散习练群体发展为具有明确分工的自治组织，参与村寨公共决策的案例日益增多，从被动的“被管理者”转变为积极的“治理参与者”，在消解社会性别偏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 身体异化：赋权的阴暗面。美学冲突首当其冲：舞台化表演对传统仪式的改编—动作“夸张化”、服饰“性感化”、鼓点“节奏化”—在赢得掌声的同时引发争议。陈正府研究发现，有些编排“变味了”，对其文化内涵和风格特征造成了破坏。代际裂痕由此滋生：年轻女性倾向于学习“舞台版”鼓舞，对传统动作兴趣缺失；老艺人则担忧“身体记忆”面临失传。隐性抵制以更微妙的形式展开：男性传承人通过强调“正宗”“传统”重新确立权威，或退守鼓点编曲、乐器制作等技术性领域。这是权力的退让还是重组？答案或许兼而有之。

(3) 多主体博弈：制度、市场与社区的权力拉锯。制度逻辑下，非遗政策的传承人认定机制深刻影响赋权方向。农村女性的体育参与始终受到地方政府支配，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向共谋”中，赋权与规训缠绕共生。市场逻辑以其商品化逻辑重塑女性身体：年轻、貌美、动作整齐成为舞台筛选的隐性标准，舞蹈内容被改造以适应商业需求，赋权悄然滑向新的规训。社区逻辑呈现历时性演变：宗族长老从反对到默许再到利用女子鼓舞队，当女性的身体能为村寨带来荣誉与资源，传统抵制转化为务实接纳。然而，当女性身体成为社区发展工具，赋权是否又一次落入“被利用”的陷阱？

5 理论生成：具身化赋权的机制阐释

(1) 身体经验的权力跃迁机制。技艺资本化是身体权力跃迁的第一重机制。身体技能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经济资本（演出收入、旅游分红）与文化资本（传承人身份、社会声誉），其转化需要组织化与市场化的中介催化。空间政治学构成第二

重机制：展演空间是权力角逐的象征场域，女性从家庭院落走向村寨广场、城镇舞台，在物理空间位移中完成社会位置跃迁，社区事务参与权的获得正是空间政治学的权力回馈。符号再编码是更深层的转化机制：传统动作被赋予新意义，女性从传统的继承者转变为意义的创造者。

(2) 具身赋权的机制特性。在地性是具身赋权的首要特征。赋权机制嵌入湘西苗族的社会文化脉络，性别秩序、宗族结构、文化传统共同塑造着赋权的可能边界与实现路径。具身性是赋权的本质特征：赋权离不开肌肉记忆累积、节奏共振激荡、多巴胺分泌愉悦、集体舞仪式感等身体体验，这些无法被教育培训或制度保障所替代。矛盾性构成内在张力：赋权与异化并存、解放与规训交织，每一次解放都可能孕育新的规训，每一次赋权都可能伴随新的异化。

(3) 理论模型的建构：具身赋权的螺旋上升。基于上述分析，可提炼“具身赋权的螺旋上升模型”：身体觉醒是赋权起点，公共展演是催化剂，资本积累提供可持续动力，权力获得是阶段性成果，新的身体实践又将开启更高层次的觉醒。这

一模型与既有赋权理论的对话中，彰显出身体维度的不可替代性——传统赋权理论多聚焦制度保障与资源获取，却忽略了“身体”这一最切己的权力载体。身体美学视角的引入提醒我们：权力的觉醒始于身体的觉醒，社会的解放始于身体的解放。在非遗保护、乡村振兴、性别平等工作中，应关注女性在具体实践中的身体体验，警惕市场化带来的身体异化风险，在创新与传承、解放与规训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因为真正的赋权，不是让身体成为更有效的工具，而是让身体成为更自由的主体。

6 结语

苗族女性鼓舞作为一种扎根乡土的身体实践，打破了传统性别秩序对女性身体的双重束缚——既重新定义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在场方式，也在鼓点的集体律动中建构了互助、共情的女性社群。同时，本研究也表明，身体赋权并非一劳永逸之事，技术变迁与现代化进程既带来了展演机会，也可能催生新的身体规训。真正的赋权，始终需要回归到女性对自身身体的主体性掌控。当鼓声响起，那些奋力击打的瞬间，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女性用身体写下的、关于自由与尊严的宣言。

参考文献：

- [1] 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M].彭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中译本序 1.
- [3] 徐选国,赵杨.迈向“赋权由我”的整合性社会工作实践与本土理论建构——基于对上海黄浦“蓝丝带”项目的质性研究[J].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23,(01):25-56+256.
- [4] 杨昌才.中国苗族民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200-201.
- [5]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50-162.
- [6] 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nelon. Traité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M].Paris: Pierre Aubouin, Pierre Emery, Charles Clousier,1687.
- [7][8][9] 邓珊珊.苗族鼓舞促进湘西农村女性社会融入的文化机制[D]. 吉首大学, 2023.
- [10]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